

中国梦与中国外交

历史、现实与未来

张 静 ◎主编

吴志成 纪亚光等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国梦与国外交

历史、现实与未来

张 静 ◎主编

吴志成 纪亚光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梦与中国外交：历史、现实与未来 / 张静主编；吴志成，
纪亚光等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012-5151-3

I. ①中… II. ①张… ②吴… ③纪… III. ①外交史 - 中国
- 近现代 IV. ①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0892 号

书 名 中国梦与中国外交——历史、现实与未来

作 者 张 静 / 主编

吴志成 纪亚光 刘集林 刘晓琴 刘兴华 李来容 于安龙
刘孝阳 贾 凯 杨丽雯 / 著

责任编辑 王瑞晴 蔡金娣

责任出版 王勇刚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电 话 010-85112689 (编辑部)

010-65265923 (发行部) 010-85119023 (邮购电话)

网 址 www.ishizhi.cn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00×1000 毫米 1/16 24 印张

字 数 38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版次印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151-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写委员会成员

主编：张 静

作者：吴志成 纪亚光 刘集林 刘晓琴 刘兴华

李来容 于安龙 刘孝阳 贾 凯 杨丽雯

顾问：王先明

序 言

无论是“中国梦”的理论诠释，还是中国外交的历史演进，都是系结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运动的宏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何谓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前途命运都是和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是和这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密切关联。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而外交之释义，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界定，当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外交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就此而言，真正的中国外交是近代才开始的。在19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到外国去。^①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中西没有交往。1514年，当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时，中国人已开始了同西方的直接交往，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

在中西方发生碰撞之前，东亚一直存着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即以“宗藩”关系来维系的“华夷秩序”。清廷的制度中没有专设的近代外交机构，只有司理朝贡国和藩属国事务的相关机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的结果是西方列强的大举进入，对外事务内容和性质远远超出原有体制功能所限。走向近代的制度变迁，首先从清王朝的对外事务方面将传统制度撕开了一个缺口。总理衙门的设立，适应了国际交往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以六部为中心的传统中央政权机构开始转型，中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清政府开始放弃闭关自守政策，希冀运用近代国际生活的一些惯例和准则来处理对外关系。

民国时期，职业外交官群体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对外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产物，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近代以来的对外关系模式。人们通常认为：弱国无外交。其实“并不符合实情。事实上，越是弱国越需要外交，越是弱国越体现外交官的职业技能。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国一直处于弱国的地位。但正因为是弱国，受到列强欺凌，就有许多对外交涉，就更需要外交”。^②民国时期外交方面的多重努力和多彩纷呈，也是实现“中国梦”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改变了中华民族百年来备受屈辱和压迫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②《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①。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新中国能够平等地位参与国际事务，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承认。这种心态既表明了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勇气，也奠定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石。

“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②走出封闭而直面世界大势的历史进程充满了曲折和艰难。1876年清朝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是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中国外交官。郭嵩焘与其《使西纪程》回国后横遭毁损，所谓“个人谤毁遍天下”，一定意义上见证了中国外交在近代文明建构中的困惑与苦涩。但是，郭氏却能做到“而吾心泰然”。其实，这种个人担当和隐忍，某种意义上已经蕴含着走向世界探索中华民族发展“道路”的自信，尽管这种自信或许是不自觉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同步展开的，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梦”的历史进程，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辉历程。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华民族的昨天正可谓“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我们大家都能感到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都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习近平强调：最后我要说的是，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会实现，我更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相信《中国梦与中国外交——历史、现实与未来》一书能够为此而有所贡献。

通读书稿后，虽然已经很熟悉其整体的纲目，也清楚它内容的设定和思想的脉线，但仍然给予我意想不到的冲击和震撼，想说几句心里话的冲动油然而生，于是写下了上述文字。聊以为序！

王先明

2016年8月16日于天津阳光100国际新城

^①《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页。

^②钟叔河：《走向丛书总序》，第2页。

目 录

第一部分 屈辱与觉醒：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步 / 001

第一章 天朝上国与万方来朝 / 003

- 一、中华帝国的世界中心意识 / 003
- 二、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与天朝体制的动摇 / 007

第二章 “天朝梦”的破灭与屈辱外交 / 015

- 一、鸦片战争与“天朝梦”的破灭 / 015
- 二、不平等条约：条约体系的形成 / 022

第三章 走向世界的外交努力与“自强梦” / 029

- 一、从开眼看世界到懵懂二十年 / 029
- 二、自强求富的洋务思想与外交实践 / 033
- 三、清末新政时期的外交变革 / 046
- 四、从“守约”到“修约”的晚清外交观念与实践 / 052
- 五、“振兴中华”梦想与外交“自强梦” / 058

第二部分 平等与自主：民国时期的主权抗争与大国梦想 / 063

第一章 北洋时期的融入与抗争 / 065

- 一、民国初年走向世界的努力 / 065
- 二、巴黎和会的失败与国民外交的发展 / 072
- 三、修约与废约：南北外交维权的竞争与合流 / 080

第二章 南京政府的“图国际之平等和平” / 093

- 一、“国际之平等和平”之梦与改订新约 / 093
- 二、现代化之梦与外交走向 / 100
- 三、抗战建国之梦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 110
- 四、大国地位的确立与战后亲美外交失败 / 122
- 五、自由、独立梦与“群众运动的国民外交” / 133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解放”梦想 / 140

- 一、早期的解放、反帝追求与加入共产国际 / 140
- 二、反法西斯的统战梦与扩大对美、苏、英等大国的交往 / 151
- 三、解放全中国与对苏美交往的独立自主 / 163

第三部分 平等与共处：社会主义强国梦的外交战略选择 / 179

第一章 新中国外交格局的开辟 / 181

- 一、冷战格局下新中国外交方针的确立 / 181
- 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 186
- 三、民间外交的广泛运用 / 194
- 四、新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 / 206

第二章 美苏争霸与中国的外交策略 / 210

- 一、中苏同盟关系的演变 / 210
- 二、寻求建立反美反帝统一战线 / 220
- 三、“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 / 226

第三章 “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 234

- 一、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 234
- 二、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突破 / 242
- 三、“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影响 / 250

第四部分 和平与发展：新时期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选择 / 259

第一章 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 / 261

- 一、时代潮流的推动 / 261
- 二、改革开放的需要 / 269
- 三、“韬光养晦”外交方针的确立 / 277

第二章 抓住发展的外部机遇 / 284

- 一、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 / 284
- 二、趋向缓和的国际形势 / 289
- 三、服务于经济建设外交原则的确立 / 293

第三章 站在历史新起点的机遇与挑战 / 301

- 一、经济崛起与外交机遇 / 301
- 二、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 / 307
- 三、民族复兴命题的提出 / 313

第五部分 现实与未来：中国梦与中国外交的作为 / 321

第一章 和谐世界：中国梦的世界维度 / 323

- 一、中国梦的追寻与中国外交历程紧密相连 / 323
- 二、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 326
- 三、和谐世界理念对中国外交的内在要求 / 329
- 四、实现中国梦与和谐世界的统筹契合 / 332

第二章 总体和稳：中国圆梦的国际有利条件 / 337

- 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 337
- 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强 / 340
-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 / 343

四、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 344

五、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和平指向 / 346

第三章 局部动荡：实现中国梦的外部制约 / 348

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 / 348

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思维 / 349

三、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不足 / 351

四、美国战略再平衡与遏制中国 / 353

五、并不安宁的周边安全环境 / 354

第四章 梦想成真：中国外交的大作为 / 356

一、履行向世界解读与推介中国梦的使命 / 356

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营造和平稳定外部环境 / 360

三、发展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 363

四、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366

五、巩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 369

后记 / 372

第一部分

屈辱与觉醒：近代中国外交的起步

第一章 天朝上国与万方来朝

一、中华帝国的世界中心意识

“中国”一词按照《辞源》的解释虽有多义，但主要的含义指华夏族建国的地区为中国（以其在四夷之中）。《诗·小雅·六月序》：“《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又《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由于华夏族、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因称其地为“中国”，与“中土”、“中原”、“中州”、“中夏”、“中华”含义相同。这一“世界中心”的观念如仅从中国内部来看很难看到其边界，而以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视角则更能将其“世界中心”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

16世纪末17世纪初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与另一名传教士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年初抵达北京，同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经历使利玛窦对于中国的了解深入，也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媒介。在利玛窦看来，“中国”一词无疑含有“位于中央”之意：“我听说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利玛窦神父替他们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并以中国字加以标注时，他尊重他们的看法，便安排得使中国帝国多少占据着中央的地位”^①。“因为知识有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夸耀成整个世界，并把它叫做天下，意思是天底下的一切，也就不足

^①[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页。该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

为奇了”^①。中国人的中国中心论根深蒂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②。“总的说来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的阶层，直到当时对外国人始终怀有一种错误的看法，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③。在利玛窦看来，正是这种中国中心论，导致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而对绝大多数外国，“完全没有察觉这些国家的存在”^④。

中国对于世界的了解，长期以来集中于周边国家，而远隔重洋的“外夷”往往被忽略，由中国作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朝贡体系”是传统的中外关系的基本面貌，再一次给予中国文化和心理上的优越感。这一优越感反映在“朝贡体系”上，“怀柔远人”往往优先于经济利益的诉求。利玛窦发现，向明朝纳贡的国家中，“在来到这个国家交纳贡品时，从中国拿走的钱也要比他们所进贡的多得多，所以中国当局对于纳贡与否已全不在意了”^⑤。“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对宝石付出更大的价钱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⑥。“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

^①[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何兆武校, 第179-180页。

^②[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何兆武校, 第181页。

^③[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何兆武校, 第216页。

^④[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何兆武校, 第46页。

^⑤[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何兆武校, 第9页。

^⑥[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 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 何兆武校, 第560页。

他国家朝贡”^①。这一“厚往薄来”、不计较经济利益的朝贡体制反映了统治者“天朝上国”的意识。这一意识到了清朝，并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因为“闭关政策”的步步缩紧，清政府在对于世界大势的了解上表现得愚昧无知。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清政府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承袭明制，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也承袭前朝体制，将宗藩制度^②作为怀柔而羁縻“远人”的重要手段。中国独特、封闭的地理位置和文明发展程度优于周边国家的事实，使得中国长期传承了华夏中心的观念，直至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的《皇朝文献通考》，仍有“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③之语。尽管满清政府是以“夷狄”身份而入主中原，其对世界的认识依旧恪守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在对外政策上也以此为基本观念。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尝遣使册封朝鲜、琉球、越南等国矣，此自抚其藩属，非外交也”^④。《皇朝文献通考》体例的设置中，有八卷四裔考，而无外交考。由此可见，18世纪末年的华夷体制——天下秩序“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中心——边缘’格局之上，即中国和周边世界”^⑤，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华夷秩序”下，中国以宗主国、“天朝上国”自居，清政府熟知的周边地理概念仅有周边各国，清政府对之均以“夷狄”视之，各国都是中国的藩属国，这样背景下产生的外交关系，也就是“天朝上国”与“藩属”的外交，表现方式即“朝贡”体制。这种体制之下，不可能产生平等外交的思想，反而在涉及对外关系上“舍本逐末”，对于外交礼仪的要求达到了严苛的地步。

《清史稿》“礼志”中详细载明“山海诸国朝贡礼”^⑥：

凡诸国以时修贡，遣陪臣来朝，延纳燕赐，典之礼部。将入境，所在长吏给邮符，

^①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第560—561页。

^② 又称“朝贡制度”或“册封体制”。

^③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第2册），卷293，“四裔考一”，考7413，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版。

^④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4册），卷337，“外交一”，考10781，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版。

^⑤ 干春松：《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3页。

^⑥ 赵尔巽：《清史稿》（礼志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9154页。

遵文武官数人伴送。有司供馆饩，遣兵护之。按途更代，以达京畿。既至，延入宾馆，以时稽其人众，均其饮食。翼日，具表文、方物，暨从官各服其服，诣部俟阶下。仪制司官设表案堂中，质明，会同四译馆卿率贡使至礼部，侍郎一人出立案左，仪制司官二人分立左右楹。馆卿先升，立左楹西。通事、序班各二人，引贡使等升阶跪。正使举表，馆卿祇受，以授侍郎，陈案上，复位。使臣等行三跪九叩礼，兴。退，馆卿率之出。礼部官送表内阁俟命，贡物纳所司。

如值大朝常朝，序班引贡使等列西班末，听赞行礼如仪。非朝期则礼部先奏，若召见，馆卿豫戒习仪。届日帝御殿，礼部尚书引贡使入，通事随行，至丹墀西行礼毕，升自西阶，通事复从之。及殿门外跪，帝慰问，尚书承传，通事转谕，贡使对辞，通事译言，尚书代奏。毕，乃退。如示优异，则丹墀行礼毕，即引入殿右门，立右翼大臣末，通事立少后。赐坐、赐茶，均随大臣跪叩，饮毕，慰问传答如初。出朝所，赐尚方饮食，退。翼日赴午门外谢恩。

礼部疏请颁赐国王并燕赉贡使，既得旨，所司陈赐物午门道左，馆卿率贡使等东面立，侍郎西面立，有司咸序。贡使诣西墀三跪九叩，主客司官颁赐物授贡使，贡使跪受。以次颁赐贡使暨从官从人，咸跪受。赞“兴，叩”如仪。退，赐宴礼部。

贡使将归国，光禄寺备牲酒果蔬，侍郎就宾馆筵燕，伴送供待如前。所经省会皆飨之，司道一人主其事，馆饩日给，概从周渥焉。

在朝贡礼仪中，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而在这繁琐的礼仪之内，最重要的是规定了贡使基本礼仪：三跪九叩。各藩属国“既为臣子，觐见皇帝施以三跪九叩之礼即是天经地义之事”^①。在这样的礼仪之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天朝上国”和“属国”、“藩邦”之间的封建等级关系。而“山海诸国”究竟包括哪些国家，则语焉不详，泛指一切外国。有研究表明^②，这一属国概念中，既包括与清政府有宗藩关系的东亚（朝鲜、琉球）、东南亚（越南、暹罗、缅甸、南掌、苏禄）、中亚、南亚等国，也包括来自西方荷兰、葡萄牙、意大利、英国、俄国等西洋诸国。在朝贡体系下，不仅周边国家与清政府的关系处于宗藩关系的框架

^① 王开玺：《清代外交礼仪的交涉与争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② 详见何新华：《清代贡物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之内，西方国家以各种目的来到中国时，清政府仍将其纳入这个范畴。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由四周的国家辐辏而构成的一个国家关系体系……中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社会的成员”^①，即费正清所称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②。

19世纪以前，朝贡制度是清政府外交体制的基本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负责与周边国家交涉的机构主要是礼部和理藩院，“礼部负责朝贡事宜，而通过藩部进行朝贡的区域（尼泊尔、希巴、布拉哈汗国及俄罗斯）则由理藩院管辖，军机处统辖之”^③，一般说来，理藩院负责俄国和中亚各国的交涉事务，礼部负责朝贡国事务。王之春编著《清朝柔远记》^④一书，记述清代自开国以来二百余年中外交涉的历史，其中记录自顺治以来的中外交涉，均以“朝贡”论。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方国家的入侵，在清士大夫看来也是“入贡”事件当中的具体问题。清政府在“朝贡体系”下故步自封、虚骄自大，将一切对外事务均纳入朝贡范畴，仍旧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沉睡不醒。

二、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与天朝体制的动摇

在朝贡体系之下，来自遥远海上的西洋诸国，清政府均试图将其纳入属国范畴之下，以葡萄牙、荷兰、俄国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国家，“他们极力想进入中国，其来华使节有的不惜照贡使的礼制行事”^⑤，这更加促使清政府对于这些国家的认识，固步于“宗藩”定制。顺治十三年（1656年），“俄国察罕汗遣使入贡，以不谙朝仪，却其贡，遣之归。明年复表贡，途经三载，表文仍不合体制。世祖以外邦从化，宜予涵容，量加恩赏，谕令毋入觐”。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复遣使义兹柏阿朗迭义迭来朝，帝始召见，赐坐赐食”。清政府对于俄国遣使来华，不记其为何而来，却反复记录其“表文”是否合于体制。康熙五十九年（1720

^① 张振鹏：“近代中国与世界：几个有关问题的考察”，张振鹏：《近代中外关系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一种初步的构想”，陶文钊编选：《费正清集》，林海、符致兴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③[日]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田建华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④首次刊刻的时间是光绪五年（1879年）。

^⑤ 张振鹏：“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近代中外关系”，张振鹏：《近代中外关系文集》，第87页。